

孩子们每晚享受按摩后入睡

——德国儿童看护院令英国人汗颜

德: 温情按摩
英: 规矩死板

图米走访了位于德国汉堡市的一家儿童看护院, 她发现, 在那里, 孩子们一天中最期待的时刻, 莫过于熄灯前。每个孩子都得到一次 10 分钟到 15 分钟的按摩, 由值班的女性看护员揉搓他们的肩膀和背部。

“这是我一天当中最放松的时刻, 我很喜欢这样”, 15 岁的雅妮娜说。雅妮娜 6 年前搬进这家 SME 儿童看护院。

在 SME 儿童看护院, 包括雅妮娜在内, 共有 6 个年纪在 15 岁到 20 岁之间的孩子。他们已在看护院住了至少 6 年。

对于新入院的儿童, 若他们有外伤或受过虐待, 也要接受晚间按摩。“但我会把它变得有趣。我会用一个玩具滑过他们的肩头, 或者假装在他们的后背揉面做比萨饼,” 看护员玛丽亚·内米茨说, “在与孩子身体接触这方面, 我们没有障碍。有些孩子曾有过负面经历, 我们得帮他们重新学会信任, 包括信任可以让另外一个人触碰自己的身体。”

图米在采访伦敦达林路儿童看护院时, 向经理克雷格描述了她在德国儿童看护院看到的情景。克雷格说: “显然, 他们认真地对孩子进行治疗。”

图米向兼职看护员诺尔玛·曼提起德国儿童看护院的睡前按摩。曼说, 这个想法太危险, “我们不会冒这个险, 我们在这里做的每一件事, 都恪守规章制度”。曼向图米展示了他们的规章制度——两卷文件。

看护员每天得同时记录 3 本日志。第一本用来记录看护员和孩子们

的行程, 手写, 禁止涂改, 每页空白处还要画上道道。第二本是孩子们日常活动的全天候记录。第三本是每个孩子的个人日志, 是他们每天个人活动和举止的全记录。全部日志至少要保存 75 年, 以免孩子将来投诉某个看护员曾对他实施虐待。

德: 恰当治疗
英: 寻求庇护

在德国, 把儿童送进看护院的原因与英国类似。大多数孩子因为受虐待或被忽视, 一小部分则因为父母不在身边, 或本身性格孤僻。

但与英国人对看护院儿童的歧视相比, 德国人普遍认为, 儿童住看护院, 是为寻求更恰当的教育和治疗, 而不是为寻求庇护。图米认为, 也许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, 在德国, 儿童居住在看护院的时间, 比英国儿童平均长 3 倍。

约阿西姆·格劳奈特已在 SME



在 SME 儿童看护院, 孩子入睡前享受按摩

儿童看护院工作 24 年。格劳奈特说: “起初, 许多父母觉得看护院是个车间, 孩子在这里可以得到修理。孩子自己也觉得, 他们来这里是因为犯了错, 要遭到惩罚。但我们努力让父母和孩子都明白, 在这里, 我们向他们展示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是可行的。我们始终强调, 在孩子的一生里, 他们的亲生父母是最重要的人。”

负责监督汉堡儿童服务工作的赫伯特·维尔曼博士说: “如果一个家庭内部发生问题, 我们的态度是, 一定存在外部原因。我们相信, 专业人士可以帮他们把问题解决。但英国人会觉得, 要么父母有问题, 要么孩子有问题。如果真有问题, 他们就应受到惩罚。”

在德国, 公众对儿童看护人员高度信任。伦敦大学教授帕特·佩特里说: “在德国、丹麦和荷兰, 儿童看护员是体面的职业。而在英国, 看护员都是一般员工。”

德: 长期居住
英: 临时收容

在德国看护院, 孩子居住的平均时间是 3 年。但在英国, 平均时间不到 1 年。图米采访达林路儿童看护院时, 院里共 9 个孩子中, 只有 2 名是长期居住, 其他孩子都是临时收容, 并无专人照料。

达林路儿童看护院经理克雷格说: “这里并不是收容所, 可却在帮收容所照看这些孩子。”

看护院为儿童提供最多不超过 3 个月的看护服务, 在伦敦并不罕见。很多英国人认为, 儿童看护员就像灭火器, 只有在危急时刻才介入。克雷格和同行都迫切希望公众能改变这种观念。事实上, 他们很想和孩子一直努力, 直到他们的人生有所改变。从一所看护院, 搬到另一所看护院, 之前还经历数段寄养生活, 不难想象这样的孩子会多么低落沮丧。卜晓明

相关链接

看护儿童主要形式
德: 定居 英: 寄养

上世纪 70 年代末到 80 年代初, 德、英两国纷纷着手进行儿童看护改革, 关闭大型儿童院, 寻找其他儿童看护形式。

英国选择家庭寄养式看护为主体、小型儿童看护院为补充的形式。全英国受看护儿童中, 有三分之二在家庭寄养。

德国恰好与英国相反。在德国, 超过三分之二的受看护儿童定居在儿童看护院。只有与自己家庭的亲恶恶化到无可弥补时, 他们才会寄养在陌生家庭。

入住 SME 儿童看护院之前, 雅妮娜也曾寄养在别人家中。可这似乎并不是一段愉快的经历。她说: “我有自己的家。我有妈妈, 哪怕我们合不来。我不喜欢住在别人家里, 被迫与完全陌生的人建立感情。”

“我喜欢住这儿。我觉得这里更自由, 即使我与这里的某个人吵架, 总能找到足够的空间躲开,” 雅妮娜说, “这里一切都井井有条, 还有看护人员给我辅导功课。现在, 我还经常和妈妈见面。毕业后, 我想搬回家与妈妈同住。”

SME 儿童看护院经理屈恩斯和同事们投入了巨大精力。他们特别重视家庭作业辅导, 孩子们也都决心在学校取得好成绩。“我们要让他们知道, 如何用另一种不同的方式生活,” 看护员内米茨说, “希望他们离开时, 不管是回到父母身边, 还是独自生活, 都能带走一些在这里学到的东西。”

法庭偏信医学权威酿成冤案

英国“谋杀亲子”案主角去世深受关注

蒙受冤狱创伤难愈

据《星期日泰晤士报》报道, 萨莉去世次日, 负责调查其死因的警官说, 不排除自杀的可能性。

朋友约翰·巴特说, 他 3 月 12 日曾与萨莉交谈, 当时她看起来精神不错。不过, “问题是遭遇这样的事情之后, (阴影) 再也不会消失”。巴特也是一名律师, 曾是萨莉辩护律师团的成员, 还曾出书讲述萨莉的遭遇。

巴特说: “这一分钟你可能是正常的, 但下一分钟可能就会再次受到那个噩梦的困扰, 想起你(在监狱里)与其他 250 名妇女一起的情景。”

重新评估类似案件

医学权威的证词被推翻后, 英国司法系统则着手重新评估类似案件, 一些判决被推翻。

《星期日泰晤士报》说, 萨莉一案暴露出英国司法系统中存在的诸多缺陷: 能力低下、专横傲慢、忽略细节、用人不当和缺乏常识。此外, 萨莉案中涉及的尸检报告中提到, 其中一名婴儿死亡时, 体内有致命水平的细菌感染, 但陪审团和萨莉的辩护律师团起初却没有看到这份报告。

安杰拉·坎宁斯洗刷了自己被控谋杀两个孩子的罪名, 在蒙冤入狱 20 个月后重获自由。她说: “我说不出口。我很生气, 这位女士(萨莉)遭受了那么多磨难。”值得一提的是, 儿科专家罗伊·梅多的观点在坎宁斯冤案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。

曾因“谋杀亲子”而蹲了 3 年多冤狱的英国律师萨莉·克拉克 3 月 16 日死于家中。英国多家媒体报道了这一事件。

萨莉原本只是曼彻斯特一位律师, 她的去世之所以受到如此关注, 原因之一是她非同寻常的悲惨遭遇: 两名幼子相继夭折, 她被控谋杀亲子, 蒙冤入狱, 获释后也一直未能从冤狱的创伤中完全恢复。

更重要的是, 这桩冤案撼动了英国法庭采信医学专家观点的传统, 司法部门开始对数百起类似案件重新评估。萨莉的遭遇, 促成其他一些人冤屈昭雪。

年仅42岁突然死亡

今年 3 月 16 日上午, 萨莉被人发现死在埃塞克斯郡哈特菲尔德佩弗里尔的家中。

当天 10 时左右, 当地医疗机构接到急救电话, 派遣一辆救护车和一辆快速反应车前往现场, 但医护人员到达之后不久便宣布她已经死亡。

萨莉的家人在她去世后发表声明说: “萨莉·克拉克的家人怀着莫大悲伤宣布萨莉在家中死亡。此事现已由法医接手, 目前尚不能提供更多信息。”萨莉终年 42 岁, 留下丈夫史蒂夫·克拉克和儿子汤姆。

两个幼子先后夭折

萨莉·克拉克原姓洛克耶, 1965 年出生于威尔特郡的迪韦齐斯, 父亲是警察, 母亲是美发师, 萨莉是家中独女。萨莉毕业于英国南安普敦大学地理学专业, 在花旗银行工作时, 结识了律师史蒂夫·克拉克, 两人于 1990 年结婚。3 年之后, 夫妇俩前往



一九九六年, 克拉克夫妇与幼子克里斯托弗

曼彻斯特发展。萨莉学习法律, 加入一家公司, 担任助理律师。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克里斯托弗于 1996 年 9 月出生。

噩梦随后开始。克拉克夫妇 12 月携幼子造访伦敦, 小家伙生了病, 症状是呼吸困难和流鼻血。大约一周后的一个晚上, 克里斯托弗陷入昏迷, 当时史蒂夫出门在外。克里斯托弗被送到医院急救, 不久后死亡。

1997 年 11 月, 克拉克的第二个儿子哈里出生, 虽然是早产, 但看起来相当健康。不过, 2 个月, 哈里出现昏迷症状, 送到医院后即死亡。

承认酗酒蒙冤坐牢

1998 年 2 月, 克拉克夫妇因涉嫌谋杀被捕。萨莉 5 个月, 受到指控, 罪名是谋杀自己的两个儿子。检

察官没有起诉史蒂夫。

同年晚些时候, 克拉克夫妇的第三个儿子汤姆出生。由于萨莉涉嫌谋杀亲子, 汤姆出生后不久即被从母亲身边带走, 交由他人监护。

萨莉涉嫌谋杀亲子一案的审判于 1999 年 10 月开始。萨莉承认自己在搬到柴郡后为了排遣孤独曾过度酗酒, 还在长子夭折后因抑郁求医, 检方力图把她描绘成“抑郁的酒鬼”。11 月, 萨莉被裁定谋杀罪名成立, 被判两次终身监禁。

萨莉坚持自己的清白, 提出上诉。2000 年 10 月, 二审裁决结果出炉: 谋杀罪名成立, 维持原判。

萨莉的律师团和史蒂夫继续调查, 发现了一份医学报告, 表明哈里曾出现脑膜炎的早期症状。上诉法院 2003 年 1 月推翻萨莉有罪的裁决, 她不久获释。

专家证词作用关键

萨莉的去世让人们再度关注曾轰动一时的萨莉冤案。

萨莉在这桩冤案中, 作为控方证人的医学专家提供的观点起到了关键作用。克里斯托弗夭折后, 内政部病理学家艾伦·威廉斯在尸检报告中说, 克里斯托弗死于呼吸系统感染。

萨莉的次子哈里夭折后, 威廉斯再次担任验尸官, 他的结论是发现哈里生前曾受虐待。这一观点得到另一名医学专家迈克尔·格林的支持。警方就此介入。非但如此, 威廉斯还把他的对于克里斯托弗死因的看法修改为窒息致死。

当时被奉为权威的儿科专家罗伊·梅多的观点也至关重要。他是“代理性伴病综合征”概念的提出者。“代理性伴病综合征”是一种精神病, 通常表现为父母(多数为母亲一方)向医务人员谎称孩子生病, 为此甚至不惜伤害孩子以制造病症假象, 后果严重时可能导致孩子死亡。医学界一般认为, 这种病患的动机是为了吸引注意, 博取同情。英国法律视“代理性伴病综合征”为虐待儿童罪行。

梅多还引出一个耸人听闻的理论: 同一家庭中相继出现两宗婴儿不明原因猝死案例的概率只有 7300 万分之一, 因此, 一旦出现这种情况, 基本可以认定家长患有“代理性伴病综合征”, 谋杀了自己的孩子。

萨莉的有罪裁决被推翻之后, 梅多不仅理论受到质疑, 还一度被吊销行医执照。他提出的同一家庭中相继出现两宗婴儿不明原因猝死案例的概率, 也被从原来的 7300 万分之一修正为百分之一到 8500 分之一之间。 陈济朋